

论范泰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吕幸福

(青岛科技大学 传播与动漫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

摘要:通过对范泰(355-428)诗文创作和人际交往的梳理,我们发现,与陶渊明(365?-427)同时代的文人中,范泰应该是第一个在诗文创作中完成对陶渊明接受的人,他的接受可能在陶渊明生前即已完成。范泰从陶渊明人品出发,独具慧眼发现陶诗中的高士内涵,并在创作中加以体认,无论是《张长公赞》还是《九月九日诗》,都能从中发现陶渊明的影响。在南朝陶渊明接受史视野中,范泰、鲍照和江淹三人构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创作接受历程,范泰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不应忽视,彰显范泰的作用,可以完善我们对南朝陶渊明接受现状的认识。

关键词:陶渊明;范泰;高士;张长公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5-0074-07

接受史视野中的陶渊明,在南朝作为人格高士的形象,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是歌颂陶渊明“高行峻节”的现存最早记载^[1],此后,沈约《宋书》、钟嵘《诗品》和萧统《陶渊明集序》都推崇其人格。对陶渊明文学创作价值的接受,学界向来认为宋代的鲍照是学陶和拟陶第一人。鲍照《学陶彭泽体》作于元嘉二十九年(452)秋,此时已经去渊明逝世 25 年,鲍照首先发现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为陶渊明诗文在后代的接受引来了第一丝曙光。”^[2]但鲍照的陶彭泽体,并不涉及陶渊明的田园诗,而是看重其“羲皇上人”般的悠然自适。鲍照之后,江淹是第二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诗人,但却是第一个推崇陶渊明田园诗的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直接把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为一种重要类型加以拟作,题为《陶征君田居》,意境神似,直可以假乱真。

不过,我们通过文献挖掘发现,在鲍照、江淹之前,还有一个人较早发现了陶渊明的诗文价值,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这个人就是跟陶渊明、颜延之同时代的范泰。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今河南淅川^[3])人,是史学家范曄的父亲,生于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卒于宋文帝元嘉五年(428),享年 74 岁。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享年 63 岁,按正史记载应比范

泰小 10 岁。元嘉四年,颜延之 43 岁。这样算来,三人应是同时代人,其中范泰、陶渊明二人年龄最为接近。范泰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高官。祖汪,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宁,豫章太守,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江州经学的关键人物。

范泰初为太学博士,后来做过天门太守、南郡太守、东阳太守、累迁侍中和尚书兼司空。进入刘宋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史书本传中记载他“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4],今有研究者把范泰定位为“文学家”^[5],并且“仕途显赫”,是顺阳范氏“自西晋以来最为贵显者”^[6],似不为过。

一 学界范泰研究现状及意义

不过,范泰在文学史上几乎是被湮没无闻的人。在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中,笔者仅发现曹道衡先生的《南北朝文学史》把范泰放在了晋、宋之际文风转变的背景下,一句话点评了范泰的《经汉高庙诗》,认为这是“借怀古以咏时事”之作^[7],体现了晋宋之际“文学摆脱了形而上的思维而重新注目于日常生活,再度恢复了缘情言志的功能”^[8],对于范泰其他诗文学作品却没作具体评论(按,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在资料发掘方面比其他同类文学史更为详尽完备,该书收录许多在其他南

收稿日期:2015-03-21

作者简介:吕幸福(1980—),山东莱芜人,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新闻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北朝文学史中没有收录的作家,并进行一一点评)。其他文学史著作对晋宋时代的作家介绍,基本都是围绕“元嘉三大家”和陶渊明的框架介绍。例如,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另外,郑振铎、罗根泽、胡国瑞和聂石樵等人的文学史中,对范泰也是只字未提。

范泰诗文作品散佚较多,今天所见仅有辑本,文 22 篇,诗六首,《古今善言》一卷。《宋书》(《宋书》卷六十)《南史》(《南史》卷三十三)各有《范泰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9],《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范泰集二十卷”^[10],《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范泰集二十卷”^[11],南宋郑樵所著《通志》中,仍录有“太常卿范泰二十卷”^[12],但元代刊行的《宋史·艺文志》已不见范泰著录,估计《范泰集》在元代已经亡佚。

上述史书艺文志以及经籍志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范泰集的著录位置皆紧承陶渊明集之后。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录有“范泰集二十卷”^[13]。依据焦竑序中所言“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14],则卷五著录《范泰集》应该是其“当代见存之书”。不过焦竑的书目似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它“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唯是书最不足凭”^[15]。笔者比较焦竑《国史经籍志》与郑樵《通志》所录刘宋时代书目发现,焦竑所录刘宋时代作家数量(同为 162 家)、作品卷数、排列顺序、写作格式等与郑樵完全一致,最大不同仅在于去掉了作家的官职称呼而已,故其序言中所说著录“当代见存之书”的可信性较差,《范泰集》在明代不可能还见存 20 卷本。《清史稿·艺文志》只录有“宋范泰古今善言一卷”,不再置于“别集”,而是置于“杂家类杂学之属”^[16],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在“子编杂家类”著录《古今善言》一卷,今天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所藏《古今善言》一卷本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版本。严可均辑《全宋文》从《宋史》《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中辑录范泰文 22 篇,逯钦立辑《宋诗》卷二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诗纪》以及《晋书》中辑录范泰诗六首,三首完整,三首残篇。

范泰诗文作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学界历来对范泰、陶渊明关系缺乏关注,从文学史以及目前所见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范泰,笔者目力所及仅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一书中

发现有关范泰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寥寥不足百字的论述,只涉及《九月九日诗》,不仅征引资料不全,而且持论亦有商榷之处^[17](另按,刘中文认为是范泰将陶渊明的“菊”与重阳节第一次在诗里联系起来,这种观点虽给人启发,但却有拔高之嫌,参看朱自清先生对九月九日咏菊诗的考察,见于《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296 页)。除此以外,没有再发现其他接受史论著中论述范泰文字。

从范泰的经历来看,他身处高位,历任东晋、刘宋尚书和光禄大夫等职,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缺乏接受的现实可能性,倒是后来的江淹,首先发现了陶诗的田园诗价值。范泰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高士诗文方面,这是在人格体认层面对陶诗的初次接受。因此,在后代理解接受陶诗内涵的丰富性方面,范泰应该占据一席之地,这对于我们加深南朝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二 从诗文创作层面看范泰对陶渊明的接受

要找出陶渊明和范泰之间的文学承继关系,首先需要从陶渊明诗文中的高士人物张长公谈起。

陶渊明诗文作品中出现了众多高士人物,尤以《饮酒》(20 首)诗中最多。此外,在《咏二疏》《咏贫士》《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中也出现一些高士人物。通过颂扬高士人物体现高士情怀,这是陶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清人方宗诚评价陶渊明《扇上画赞》时说,诗中提到的高士是“渊明心所向往之人”^[18],是陶渊明理想人格的一种寄托。陶渊明笔下的高士人物不仅来自于《高士传》,而且他还依据对理想人格的构建标准,把历史上一些没有进入《高士传》的人物,赋予了高士一样的人格内涵,典型的莫过于《饮酒》中出现的张长公。《饮酒二十首》第 12 首云:“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19]

诗中出现的“长公”即张挚,西汉文帝时人,史书中并没有单独为其列传,关于他的材料仅见于其父张释之的传记中。《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跟张挚有关的记载只有这么一句:“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20]

在陶渊明之前,并没有文人在诗中特意提及张长公,把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挖掘出来,推崇其人格,赋予高士的意义,这是陶渊明首创。张长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陶渊明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自我道德期许,让他从张长公身上获得了榜样力量,找到了情感共鸣,在诗中把

长公跟历史上的著名高士人物比肩吟咏。从陶渊明开始,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高大起来。除了在《饮酒》中提到他,陶渊明还在《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中再次提及,《读史述九章》中最后一首为《张长公》:“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独异(或为“世路多端,皆为我异”。逯钦立和龚斌皆持此论。分别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台湾:台北里仁书局,2007:500;逯钦立《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85。笔者认为“世路皆同,而我独异”更符合史书中对张长公的描述,故从《艺文类聚》)。敛辔謁来,闲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21]《扇上画赞》中涉及张长公内容:“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22]这里都是褒扬张长公的为人及事迹,肯定其高尚人格。陶诗中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三彰其名,较为罕见。受陶渊明影响,张长公在后代文人那里获得更多认可,历代不乏歌咏之作,限于篇幅,本文只提范泰。

继陶渊明之后,首先认同张长公的是跟陶渊明同时代的范泰。范泰有一篇《张长公赞》,该文最早见于《艺文类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以辑录。内容如下:

宋范泰《张长公赞》曰:长公秉心,独逸世表。量物难同,审己弥了。情虽高遂,迹无抗矫。靡当夷惠,孰识多少。^[23]

范泰《张长公赞》在《艺文类聚》中跟《宋陶潜张长公赞》同在“隐逸”条目下,且前后相继,在同一页上。从“赞”的内容和在类书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范泰的“张长公”跟陶渊明的“张长公”实际是指同一人,即西汉张挚。从前面分析可知,陶渊明首先赋予了张长公高士人物的人格内涵,范泰《张长公赞》同样颂扬长公人格,由此推测,范泰此文极有可能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而创作。

仅凭此一篇文章,或许不足以说明问题,范泰留存下来的文章除了《张长公赞》,还有《吴季子札赞》^[24]。吴季子,名札,春秋吴公子,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皇甫谧《高士传》中有此人。不过吴季子事迹流传较广,不见得范泰《吴季子札赞》即取材于《高士传》,但可以看出,范泰对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同样期许,这跟陶渊明非常相似。范泰另有一篇《高风赞》。全文如下: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兹已降,显默参差。智为世骇,才为物奇。迹出无泯,潜跃俱驰。暧暧若人,孰测其为。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冲情莫亮,污迹示疵。轻俗无际,肆志莫羁。^[25]

范泰提到的“高风”,到底是嵇康《高士传》中的高士人物“高风”,还是另有所指?文多隐晦,没有明说,历来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解释。不过,针对范泰这篇《高风赞》,笔者在其子范晔所著《后汉书》中找到了理解的依据。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高风传”后,有这样一段话: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棲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犹且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26]

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风赞》,还有助于我们侧面了解范泰之为人。范晔提到的“先大夫宣侯”,即其父亲范泰(范泰去世后,“谥曰宣侯。”^[27]),“高文通”即高凤(“高凤字文通”^[28]),范晔说他父亲范泰“寓乎逸士之篇”,不过史书中为隐逸高士单独列传正是从范晔《后汉书》才正式开始(范晔《后汉书》单列《逸民列传》或许受到其父范泰的影响),范泰当然不会看到《后汉书》(范晔35岁完成《后汉书》时范泰已去世多年),范泰看过的“逸士之篇”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文人容易见到的《高士传》,当时对于高士、隐士和逸士的概念是可以通用的,这从范晔《逸民列传》中的收录情况可以看出,其中部分收录人物在嵇康《高士传》中也出现过,在此不必纠结于高士、逸士的名称差异。范泰对于高凤非常赞赏,他读到“高文通传”时,“辍而有感”,并“著其行事而论”,认为“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范泰《高风赞》的吟咏对象,实际就应该是东汉初期汉肃宗(汉章帝)时期的高凤(高凤生活在东汉初期,见范晔《后汉书》记载,“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29]),也就是嵇康《高士传》中的高凤。《高风赞》中“冲情莫亮,污迹示疵。轻俗无际,肆志莫羁。”与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范泰对高凤“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的评价是一致的,实即高凤高尚人格的写照,对高士人物高尚人格的推崇,这是范泰与陶渊明一致的地方,于此不难理解范泰为何会创作《张长公赞》。

我们知道,陶渊明可能读过《高士传》(按,唐宋一些十卷本的《陶渊明集》(北齐阳休之编)中,有《四八目》,或曰《圣贤群辅录》,其中出现注引嵇康《高士传》或者皇甫谧《高士传》内容。另外,朱光潜《诗论》第13章“陶渊明”中认为,“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看,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

《列仙传》那一类书。”见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0），那么范泰到底有没有读过《高士传》，在范泰写给谢灵运的一封书信中，给出了答案。这封书信在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名为《与谢侍中书》，其中有“历观《高士》，类多有情”一句^[30]，说明他确实看过《高士传》。而据《广弘明集》，范泰与谢灵运之间的这次书信往来记载更为确切，《广弘明集》中，收录了范泰的《佛赞》《与谢侍中书》，与之并列的还有谢灵运的《答范光禄书》《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并序》^[31]。

范泰除了《张长公赞》这篇文章，还有一首《九月九日诗》跟陶渊明有关。《九月九日诗》：“劲风肃林阿，鸣雁惊时候。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32]其中有“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一句，即把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用“篱菊熙寒丛”的形式翻出，别具一格。这既是对陶诗的创新性改造，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九月九日重阳节咏菊主题的接续（参看朱自清先生对九月九日咏菊诗的考察，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6），在对陶诗内涵的把握上，范泰较为准确地揭示出陶诗内容方面与高士人格联系密切的一种显著特征，这是在南朝推崇陶渊明人格的背景下，对陶诗作出的选择性接受。至于陶诗中的田园风格，则到了梁代江淹那里才有了初步接受。在陶渊明时代，田园诗在当时文坛并没有获得认可，因为陶渊明的诗文是跟主流的文学审美趣味相背离的，“连具备相当审美能力的一代文豪颜延之都发现不了陶渊明的诗文之美，其他一般士人就可想而知了。”^[33]稍后的鲍照《学陶彭泽体》，其中并未涉及田园诗，梁代江淹的《陶征君田居》，开始彰显陶诗田园特色，不过这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梁代文坛似乎普遍对陶诗评价不高，钟嵘《诗品》中曾指出时人评价陶诗为“质直”的“田家语”（曹旭解释“田家语”为“农夫质朴无文的日常生活语”^[34]）。从范泰、鲍照和江淹三人身上，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陶渊明诗文的接受变化轨迹，在南朝经历了一个从人品到诗品的过渡阶段。

因此，从范泰《张长公赞》《吴季子札赞》《高凤赞》这三篇文章以及他和谢灵运的书信往来看，他虽身居高位，但熟悉《高士传》，对高士人格同样期许，并不陌生。不排除他看到陶渊明的高士类诗后，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是范泰创作《张长公赞》的心理接受基础。那么，范泰有可能接触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文吗？虽然不见陶渊明、范泰直接交

往的历史文献和诗文资料，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当时交往的朋友圈子来作比较接近史实的、合理的推测。

三 从人际交往层面看陶渊明对范泰的影响

范泰跟颜延之熟识，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一诗可以为证。关于诗题，《六臣注文选》张铣注曰：“颜延之、范泰俱为中书侍郎，旧园即会稽始宁之园也，宋太祖（按，此处应为宋文帝）遣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令仕故有此行也。”^[35]另外，清代《采菽堂古诗选》中对“颜范”的注解也是“颜延之、范泰也。”^[36]颜延之于元嘉三年任中书侍郎，范泰于东晋末也曾任中书侍郎，元嘉三年又任侍中，所以谢灵运诗中称他们二人“颜范二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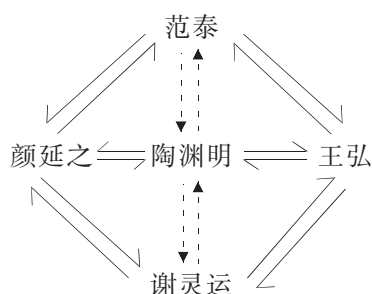
谢灵运这首诗的背景是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刘义隆诛杀徐羨之、傅亮，亲自率师征讨谢晦，三月回到建康。不久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谢灵运不赴；再征，仍不赴。于是宋文帝让颜延之、范泰充当说客，劝说谢灵运出仕^[37]。可以看出，颜延之、范泰和谢灵运这三人的关系绝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是彼此交情很深。否则，宋文帝就不会在两征谢灵运不成功的情况下，改让颜延之、范泰去劝说谢灵运。顾绍柏认为范泰“与谢灵运有忘年之交”^[38]（范泰年长谢灵运30岁。元嘉五年，范泰74岁，谢灵运44岁^[39]），曹道衡先生认为范泰、谢灵运和颜延之是刘宋时期的“著名人物”，甚至能左右宋文帝的宗教信仰^[40]，这在何尚之（382—460）《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中可以找到依据。宋文帝对待中何尚之说：“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按，颜延之与何承天曾就“达性论”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有关文章见于《弘明集》卷四）、宗少文（宗炳，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41]宋文帝虽是针对佛理的一段议论，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信手拈来点评的观点则是来自号称“前达及卿辈时秀”的范泰、谢灵运和颜延之。谢灵运最终选择出仕，也的确跟二人的劝说有关，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42]。文学史上常把颜延之、谢灵运并称为“颜谢”，也有“元嘉三大家”把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并称，唯独不见范泰，这固然跟范泰文学成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但却不能忽视范泰对

颜、谢等人的影响。《宋书·范泰传》说范泰“博览典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不倦”，范泰尤其对谢灵运有荐举之功，范泰“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可见范泰在当时文坛也不是等闲之辈。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颜延之和范泰不仅同朝为官，而且彼此熟识，并且还拥有相似的朋友圈子。如二人的好友中均有谢灵运、王弘（按，范泰与王弘的日常交往见《宋书·范泰传》，第1622页。王弘跟范泰同朝为官，二人有书信往来，可以推测，范泰通过王弘，亦能了解陶渊明。另外，严可均辑《全宋文》卷十五，收录范泰《与司徒王弘诸公书论道人踞食》，第2517页；王弘与谢灵运的交往见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424-429页；王弘跟陶渊明的交往见《晋书·陶潜传》、《宋书·陶潜传》）。《南史·范泰传》载，范泰死后及葬，王弘抚棺痛哭^[43]，可见二人交情之深。而据李剑锋考证，王弘跟陶渊明个性相投，“交往接近九年”^[44]。尽管史书中没有留下陶渊明和范泰直接交往的史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文人的诗文资料合理推测，陶渊明、范泰二人可能通过颜延之、王弘等人的中介而彼此熟悉，包括各自的为人及诗文。

颜延之深知陶渊明之为人与诗文，“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45]。颜延之的诔文中妙用陶渊明诗文典故“娴熟、贴切，如数家珍”^[46]，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如诔文中说，陶渊明“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即令人想到陶渊明《移居二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及《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虽然诔文中并没有直接点评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但可以看出，颜延之对陶渊明诗文相当熟悉。所以，不难推测，跟颜延之同样熟识的范泰，总能够对陶渊明有所接触和了解。甚至可以推测，范泰有可能看过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时，范泰仍然健在。颜延之在诔文“序”中交代陶渊明的谥号时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47]。颜延之问询的诸多好友中，应当也包括范泰在内。前面说过，颜延之、范泰彼此交情较深，范泰又较颜延之年长近30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为彼此共同的好友选用谥号此等严肃之事，颜延之应该会征询范泰的意见。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范泰《张长公赞》与陶渊明诗文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关联（按，还可以从周续之那里找寻陶、范二人相识的线索。《宋书·隐逸传》周续之条下记载：“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召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

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于此可以看出，周续之曾经在范泰父亲范宁举办的学校里“居学数年”，并且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名冠同门，号曰颜子”；而周续之后来又成为“浔阳三隐”之一，算是陶渊明的知己，陶渊明有诗见赠，所以，通过周续之的中介，估计陶渊明也能为范宁父子所认识。另外，逯钦立先生《读陶管见》（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3月，第25-26页）中认为，陶渊明少年时“游好六经”受到了范宁在豫章提倡经学（江州经学）的影响）。范泰与陶渊明等人的交往关系图示如下：



注：实线箭头指确定有交往；虚线箭头指可能有交往

按照常理推测，范泰身居要职、官居高位，宋高祖刘裕、宋文帝刘义隆都对他恩遇有加。如“高祖还彭城，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48]“上（宋文帝）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累陈时事，上每优容之。”^[49]按说他不可能对张长公这样一位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主动产生兴趣。合理的解释是，除非受到来自他人的影响。而最早在诗集中颂扬张长公的是陶渊明，陶渊明又是范泰朋友圈子里的熟客，虽不见两人直接交往的文献记录，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泰作《张长公赞》，最有可能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并且，从文章内容看，范泰显然接受了陶渊明对张长公人格高士的分析定位。

此外，从史书传记中有关陶渊明、范泰和颜延之三人的记载来看，虽然他们仕宦经历不同，但他们三人在生活行为和性格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给人感觉他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沈约《宋书·陶潜传》中说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50]《晋书·陶潜传》载其“少怀高尚，颖脱不羁，任真自得”^[51]。

《宋书·范泰传》中说范泰：“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52]又“博览典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不倦。”^[53]

颜延之虽然写了不少庙堂应制之作，但这是一个“十分傲岸”的人^[54]。史书本传中记载：“延之少孤

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55]“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56]“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57]

从三人的传记中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即是好酒,好为文章,真率,不拘小节,任性自我,傍若无人,都带有一定的魏晋风度。从颜延之对陶渊明的大力推崇来看,作为颜延之好友的范泰,估计也能有所耳闻。

范泰在文学史上几乎算是一个被湮没无闻的人,可是通过对范泰诗文创作和人际交往的梳理,我们却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跟陶渊明同时代的人文中,范泰应该是第一个在诗文创作中完成了对陶渊明接受的人,他的接受可能在陶渊明生前即已完成。他从陶渊明人品出发,独具慧眼发现陶诗中的高士内涵,并在创作中加以体认。无论是《张长公赞》《高凤赞》还是《九月九日诗》,都能从中发现来自陶渊明的影响。在南朝陶渊明接受史视野中,范泰、鲍照和江淹三人构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创作接受历程,从中可以窥见陶渊明在南朝从人格高士向文学名士的认知转变,除了田园诗,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闲适心态,至少在陶渊明时代就受到文人关注,范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从对陶渊明的接受角度来看,范泰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67.
- [2]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26.
- [3]薛国屏.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287.
- [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3.
- [5]王大良.南阳顺阳范氏研究——南阳家族史系列研究之二[J].南都学坛,1990(5):86.
- [6]王大良.南阳顺阳范氏研究——南阳家族史系列研究之二[J].南都学坛,1990(5):89.
- [7]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3.
- [8]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6.
- [9]魏征.隋书:卷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72.
- [10]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67.
-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90.
- [12]郑樵.通志(二):卷六十九[M].台北:新兴书局,1965:818.
- [13]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卷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255.
- [14]焦竑.国史经籍志(一):卷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
- [1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258.
- [16]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4358.
- [17]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9.
- [18]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台北:里仁书局,2007:506.
- [19]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94.
- [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56.
- [21]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52.
- [22]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76.
- [2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2518.
- [2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2518.
- [2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2518.
- [26]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69.
- [27]沈约.宋书·范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3.
- [28]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68.
- [2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57.
- [3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2517.
- [31]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M]//四部丛刊初编.
- [3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44.
- [33]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35.
- [34]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67.
- [35]李善.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7:477.
- [36]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M]//清康熙刻本.
- [37]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2004:184-185.
- [38]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2004:185.
- [3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3;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2004:598.
- [40]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9.
- [41]释僧祐.弘明集:卷十一[M]//四部丛刊初编.
- [42]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2004:184.

- [4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848.
- [44]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23.
- [45]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40.
- [46]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J].北京大学学报,2005(5):89.
- [4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8:2646.
- [4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16.
- [4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1.
- [50]沈约.宋书:卷九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8.
- [51]房玄龄.晋书:卷九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60.
- [52]沈约.宋书: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16.
- [53]沈约.宋书: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3.
- [54]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68.
- [55]沈约.宋书: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91.
- [56]沈约.宋书: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02-1903.
- [57]沈约.宋书: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03-1904.

【责任编辑 岩 宏】

(上接第73页)

十三经是统一的整体,不论是注是疏,都是以彼经证此经,环环相扣,于此证见中国古代学者用思绵密之处。正因为此,点滴疏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我们也只能到《十三经注疏》内部寻找正确答案。现在时贤提供了《毛诗正义》这个整理标点本,既开了先河,又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韦昭.国语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65-566.
- [2]许慎.说文解字[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7.
- [3]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71.
-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33.
-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384.
- [6]李学勤.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60.
- [7]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96-797.
- [8]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23.
- [9]彭林.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31.
- [10]彭林.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99.
- [11]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39.
- [12]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8.
- [13]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68.
- [14]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68.
- [15]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69-1370.
-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339.
- [17]黄怀信.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40-242.

【责任编辑 王 涛】